

《有闲阶级论》的理论成就

赵 锋

摘要: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是现代消费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这一领域最值得认真阅读的著作。本文试从三个方面讨论这本经典著作,其一,《有闲阶级论》并非如其表面那样容易阅读,及其理由何在?其二,《有闲阶级论》一书包含三个上下连贯的组成部分:凡勃伦的社会哲学和方法论(一般理论);关于有闲阶级的系统理论;对有闲阶级现象的系统观察;其三,从分析社会学的理论视角看《有闲阶级论》的理论得失。

关键词:有闲阶级论 消费社会学

好的理论作品是伟大心灵对伟大的历史事变的创造性反应,这类作品虽历经数个世代,仍然能够砥砺读者的思索,敏锐读者对事实的洞察,促成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反思。《有闲阶级论》当位列于这类作品之中。

《有闲阶级论》出版于189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斯宾塞的《第一原理》(1862年),泰勒的《对于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1865年),施穆勒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年),滕尼斯的《共同体与市民社会》(1887年),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1887》(1888年),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1890年),涂尔干的《劳动分工论》(1893年),桑巴特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1896年),齐美尔的《货币哲学》(1900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年),帕累托的《一般社会学大纲》(1916年)。这个书单还可以向前和向后延伸,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同时代著述的一般特征。那是一个西方文化互相融通的时代,一个思想互相激励的时代,一个多学科齐头并进、互促发展的时代。“有闲阶级论”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原创性的理论。

本文主要从分析社会学的角度展现和评估这一著作所达到的理论成就,其一,“有闲阶级论”何以难读?其二,“有闲阶级论”的一般理论和关于有闲阶级现象的具体理论;其三,有闲阶级的理论的主要成就和可能的缺陷。

一、“有闲阶级论”何以难读

有学者评论,“他(凡勃伦)同代的社会学家中没有像他一样的,言辞被广征博引,著述却少有阅读”(Edgell, 1975)。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著作本身难读,在阅读过程中,让读者很难心平气和地随着作者的理论思绪,像作者一样去观察现象,去分析现象中所蕴含的内在机理。由此读者很容易走向两极,或简单地肯定或粗暴地否定。当然,这部著作难读有它自身的原因。

原因之一是这本著作的语言风格。凡勃伦长于修辞,杜尔夫曼(Dorfman, 1961: 174)认为:“以文学的观点论,这本书无疑值得授予英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充盈的文学技巧,包括语源学的精确,模糊的语言,尖锐的对比,比较每一个形式的变化。这类技巧很少出现于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研究中。”米尔斯也同意该书富于风格(Mills, 1953: vi),而风格则是大多数社会学家要避免的,也不能象历史学家那样常以独特的风格写作,因此凡勃伦给人的印象是像历史学家,更胜似社会科学家。可能正是著作的这种语言风格把深邃的理论隐寓在嘲讽式幽默的后面,富于修辞的、“嘲讽”和“讥刺”的语言风格,让有相同偏好的人气血翻涌,难以静思冥想;而拙于修辞、思想严肃的读者会认为作者思维模糊、不精确、不清晰,轻浮、浅薄,不值一读。

原因之二是,这本著作的道德问题或政治立场。许多初读的人都不禁会惊骇于作者所显示的“不道德”,以及激进的政治立场和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例如,作者称宗教虔诚是未开化阶段万物

有灵论的继续;神甫是穿着号衣的仆从;商人是如狼似虎的掠食者;高等教养是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的表现;私人所有权源于男子对女性的压迫,等等。难怪该著作刚一出版,就有学者在《耶鲁评论》上评论道,这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著作,在严肃的科学思想者中,把社会学变得很不名誉;并根据经济学判断该书“思虑不周,有恶意”,“充斥了判罪式的命题,常带有革命和耸人听闻的性质”(Dorfman, 1961: 191)。四十多年后,批判理论的先锋判定“凡勃伦攻击文化”(Adorno, 1941)。我认为这许多负面的评价中有一些是中肯的,但更多的源于读者与作者道德或政治立场的不相容。

原因之三是,“有闲阶级论”隐含了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有学者(Mayberry, 1969; Edgell, 1975a; Harris, 1953)把凡勃伦当做社会哲学家,认为他的著作隐含有的人性论和演化变迁的理论;也有学者(Davis, 1945; Walton, 1993; Harris, 1951)认为“有闲阶级论”呈现了一个宏观的经济社会学,而该理论贡献未被人们广泛地认识;科瑟(2007)称凡勃伦提出了动机的社会成因论、知识的社会决定论,以及社会变化的理论。这些论断都说明了有闲阶级理论既富于理论的抽象,又不乏对日常最平凡的现象的细致观察和精确分析。在《有闲阶级论》后,作者还著有《商业企业理论》(1904),《营造本能》(1914),《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1915),《和平性质的考察》(1918),《美国的高等教养》(1918),《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1919)等,这些著作的基本论点都包含在有闲阶级理论中,是它的继续和发展。

二、有闲阶级理论的基本成就

熊彼特(2009)在对分析和科学的论述中指明分析社会学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它是有关社会现象的知识。在构建这类知识的过程中,人们有意努力使之完善,使之有体系;其二,这种知识的构建基础首先在于以一定的观念,把所要研究的现象从变化的混沌状态中凸显出来,使之成为可以被观察和分析的对象;其三,由于构建知识的努力,我们会发展出一系列的思维习惯,包括概念、方法和技巧;其四,正是通过这些概念、方法和技巧,我们把对现象的观测变为事实,并以此作为理论发展的基础;其五,理论是对事实的概括,以命题组、图示、方程(组)、隐喻等方式简化地总括了事实的性质、特征、趋势等内容;理论是概括了的,或简化了的事实,也是用以发现新的事实工具箱。

正如熊彼特(2009: 71)所言,“分析工作必然要有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为前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即是观念。”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是属于分析社会学的。有学者论证(Edgell, 1975)有闲阶级理论包含两个相关水平的理论构造:一般演化理论和所研究现象的具体理论。我认为第一水平的理论构造即熊彼特的观点,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是观察和分析的必要准备;第二水平的理论构造是观念的结果,是从现象到事实,再生成理论概括的分析工作。两者密不可分,相依共存。

(一)演化人性论

同其他学者不同,我认为凡勃伦依据自己的哲学、道德和政治立场,运用当时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建构了他自己的观点,即一个演化的人性论,演化的人性论是分析前的认识框架。

演化是文化的演化。关于文化,凡勃伦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根据凡勃伦对文化一词的使用,它大约是指共同体因应环境变化而做出努力的全部成果,这既包括人性的发展和变化,习惯、风俗的生成和演变,也包括物质成果和技术手段的进步。而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主要表现在共同体的精神气质上。

在文化的演化过程中,首要的变化在于从文化的“和平阶段”,也是野性阶段,向文化的“掠夺阶段”,即未开化阶段的演变。所谓文化的“和平阶段”也是人类最不发展的阶段,人类在此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环境施加于整个共同体之上的生存压力;在这个阶段中,人类的全部活动都是求生存的活动,生产活动和非生产活动还没有分化,劳作的技术也还没有发展,劳作的物质成果仅能维持共同体的生存需要,还缺乏积累。同样,野性阶段的共同体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存在,还没有阶级

的分化,有闲阶级制度也没有出现。和平阶段受营造本能支配的共同体因应周遭环境变化带来的生存压力。具有营造本能的人是一个能动的行动者;而营造本能则是一种人人具有的天赋或偏好。这种本能偏好能够感知事物或技术的实用或效率的优点,也能感知无益、浪费或无能的缺陷。基于营造本能,人们偏爱实用和效率,嫌恶无益、浪费和无能。这种本能无疑是推进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平阶段的共同体还具有另一种本能,即同族团结一致的本能,这是人类道德意识的源泉,是诚实、公正、宽容、善心观念的萌芽。还有一种本能被称作无益的好奇心,是人类知识和技术的源泉。所谓文化的和平阶段可能即是指人类求生存的活动具有和平的性质,也指人类共同体内部的未分化状态和和平的性质,也可能指人类还处于本能的阶段,共同体本身的精神还没有发展。随着环境和情势的变化,随着共同体知识和技术的发展,随着劳作的物质成果的丰富,文化也不断演变,并终将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掠夺阶段。

文化的“掠夺阶段”是共同体的未开化状态。由于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共同体的生存手段的获取变得相对容易,物质成果也有了相当的积累,这就促成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允许共同体中的相当比例免于日常劳作,其结果是随着活动事务的多样化和专门化,一条明确的界限被置于劳作的和非劳作的事务之间,生产和非生产的事务有了相对明确的和一贯的区分,劳动分工得到较以往全面的发展。非劳作的事务主要表现为由男子承担的拓殖活动。拓殖简单说是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即他人的心血变为自己的目的物。拓殖活动由杀戮和侵占组成,是力与诈的体现。文化的掠夺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早期未开化阶段,也是文化转变的关键期;第二个期为掠夺文化的完成时期,在这一个时期中,有闲阶级制度有充分的发展;第三个时期为准和平阶段,私人财产权和财富的积累为此一时期的特征。

早期未开化阶段在人类文化的演化过程中最关键。正是在这一时期,共同体的营造本能开始转向人际间的竞争和致嫉式对比;共同体的习性和制度由之而得以发展;共同体的同感、意识和精神开始成为人类文化演化的要素和作用力。

文化的演化与人性的发展同时并进,相互促成。人性的发展,首先是营造本能的转化。在早期掠夺阶段,劳作活动和非劳作活动开始分化,男子开始习于依武力和欺诈为基础开展拓殖事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共同体的生活情势或传统开始引导营造本能转向人际间在活动效率上的惯常比较。其结果是,营造本能在共同体的特定的人群中(在早期掠夺阶段是共同体中的男子、战士和猎人)转化成致嫉式对比和人际间的竞争倾向。致嫉式对比的基础在于人类在认识上的倾向,以尊和卑、贵和贱、值和不值给不同的事物分类。这种认识倾向最初可能只是指向事(共同体的各种事务活动)和物(共同体生活的物质条件或活动成果)的,后来发展为以人为基础的比较,区分勇武的人和懦弱的人、高贵的人和卑贱的人。这种人际的致嫉式比较从共同体内的男子和女子的对比,扩展到共同体间的对比,扩展到共同体内部男子间的对比,扩展到个体间的对比。人际的致嫉式比较带来人际间的竞争。竞争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和他人,也就是自己的竞争对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其次竞争者通过宣称、展示(或表现)努力证明自己属于尊贵的一端,而非类属于卑贱。在新的文化条件下,共同体生活的新情势下,伴随着业务的分化的明确和扩大,营造本能或致嫉式比较和竞争终于渐演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习性和制度。

习性是处在这个特定的文化转变阶段上的共同体及其成员,其本能(天资或倾向)受长期从事某些事务活动的作用而形成的特定的反应模式。一般而言,本能是人的天性;习性是人的天性受熏染或习染而成的。人有两种基本的习性,思想习性和行动习性。思想习性是对各类目的和活动的方向加以区别和分类的一种积极的反应模式;行动习性反映在共同体及其成员的活动中,它表现为目的、意向和手段的特定性和一贯性。从原始野性阶段向未开化阶段的转变过程中,共同体及其成员首先发展的是生活一贯的好战习性,即生活的掠夺习性,且首要表现为共同体中男子的习性。受早期掠夺文化的熏染,男子活动越来越具有拓殖的特征,由于致嫉式比较和竞争的刺激,追求勇武,宣称勇武,表现勇武,证明勇武愈益成为男子的行动习性。而战利品——勇武的成果——作为可见勇武的证据,作为生活必备品在男子的思想习性中确立了位置。

制度是习性自然发展的结果,是共同体对环境、条件或情势变化所引起的刺激做出的一种习惯的反应方式。制度的生成是不可自制式的,且是累积式的。不可自制式表明新的制度创造新的条件,新的条件诱导习性的新变化;累积式表明新制度是累积的变化中伴随着的恒定后果;而恒定是因为人性的潜在特性(倾向、天资)保持不变。制度是习性发展的结果,转而成为促成习性变化的作用力。它诱导新习性,保存旧习性,压制或淘汰某些习性。制度就其表现而言是就共同体中流行的礼法、风俗和习惯。

文化的和平阶段和掠夺阶段间的真正差别是精神的差别,而共同体精神状态的变化是其生活的物质环境变化的自然结果。共同体的精神状态一方面表现为共同体的相同感受,即普遍存在的敏锐感觉;感觉的东西经过意识的深刻的思考终会成为生活的理论。早期掠夺阶段最重要的精神是男子的勇武精神。

人类在共同体中的生活,同其他生物的生活一样,存在生存的竞争,是一种适应淘汰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演化是适应环境、条件和情势变化的思想习性的自然淘汰过程。

凡勃伦认为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化转变需要提及,其一是,由文化的掠夺阶段演变成准和平的劳作阶段;其二是,由准和平的劳作阶段演变成由机器所支配的现代社会。当共同体的日常生活中劳作活动逐渐代替掠夺活动,在男子的思想习性中积累财产逐渐代替掠夺来的战利品作为自身优等和成功的习惯性标识时,文化的掠夺阶段也随之渐演成准和平的劳作阶段。在这种情势下,人性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伪饰的发展,即两种对立的倾向——人人所具有的营造本能同致嫉式比较和竞争的倾向——的调和。在有闲阶级制度下,明显浪费是一种生活习俗,而此种习俗同人本身所有的营造本能冲突。营造本能要求对明显无益的事物和行为坚决予以摒弃,由于受到求取声望的倾向的压制,便以伪装的面目出现。

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最突出表现在于复归。人性的复归朝两个方向进行,复归于和平阶段的营造本能,复归于掠夺阶段的掠夺倾向和掠夺意志。人性向这两个方向的复归受现代经济制度的作用。凡勃伦认为现代经济制度大体可以分作两类,金钱的和工业的,金钱的制度同所有权和赢利有关;工业的制度同劳作或生产有关。工业的制度要求以集体的利益为目标,要求有助于集体利益的个性特征:诚实、勤奋、温和、亲善和大公无私、对因果律有常识性的认识和理解;金钱的制度以私人的利益为目标,同私人的直接利益最相宜的是精明狡狴的买卖作风和蛮横霸道的经营方式。实现两类倾向或个性复归的方式有:一方面对从事特定类别工作(金钱的或工业的)人和阶级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对不适合某类工作的个体和家庭加以淘汰、抑制和排斥。前一种是制度的教育作用,后一种是制度的淘汰作用。

概要地说,凡勃伦的演化人性论认为:其一,人类文化是渐变的,文化演化的基础在于人性对人类环境、条件和情势的因应方式;其二,有一个和平的文化阶段,此阶段的人性在于营造的本能、父母的天性和无目的的好奇心;其三,因为环境和情势的变化,共同体的男子开始习于捕猎和杀戮,营造本能被引向致嫉式比较和竞争,文化也随之演变成掠夺性的;其四,劳作和非劳作事务的分化促成习性的发展,习性的自然成果是制度,制度又转而作用于习性;其五,伪饰和复归都是人性在新的文化条件下呈现的重要特征,它们又进而促成新制度的发展。

凡勃伦的演化人性论是一种分析前的观念,“非分析”是一种工作假设。有两项理由支持上述论断。

理由一,凡勃伦的演化人性论的提出用的是构造的方法,而非证实的或思辨的方法。凡勃伦仅仅是从其他不同学科中借用了相关的知识和概念,并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它们。凡勃伦的知识基础是哲学的和经济学的,他深受达尔文演化论的影响,且积极利用当时人类学和心理学已取得的成就(Dorfman, 1958; Edgell & Tilman, 1989)。在凡勃伦发展自己的演化人性观之前,人性论早已是哲学和经济学的的一个部分,也是他久已熟知的。凡勃伦从心理学那里借来了本能和习性,从哲学那里拿来了感知,意识和精神,以人类学知识为基础,用演化论作框架,铸成了自己的演化人性观。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仅仅是描述了整个演化人性观的概念框架,用人类学的知识使整个概念

框架显得有血有肉,而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明,无论是以经验概括或经验论证的方式,还是以哲学思辨的方式。

理由二,演化人性观的提出不是凡勃伦的最终目的,它是一个工具,其功用在于引导凡勃伦去观察制度和社会的变化,而他的目的也在于分析有闲阶级的种种现象。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分析前的概念框架,没有演化人性观,凡勃伦是不可能把有闲阶级的种种现象从社会现象的混沌状态中抽离出来的。各种社会现象无非是人性在因应环境变化时自然分化、整合、变形所呈现出的特征或趋势。因此,恰当的人性论是分析各种社会现象的必要基础,有区分、归类、评估、判断种种社会现象的作用。

观念是一种积极的意向。它投射于混沌的现象之上,照亮了某个区域,使其从整体中显现出来,进而将现象领域转成观察者和分析者所能经验和认识的对象。分析社会学理论的基础要求有恰当的人性论,而作为分析前认识的人性观的有效性既不在于哲学的自明性,也不在于经验的可证实性,而依赖立足于其上的分析社会学理论的效力。凡勃伦的演化人性观的有效性有赖于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现象的观察是否全面和系统,有赖于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现象的分析是否确实、完整和简洁。

(二)关于有闲阶级现象的观察和分析

1. 基本的观察区分

为了观察到有闲阶级现象,凡勃伦运用了一组基本的观察区分。这组观察区分包括:劳作事务和非劳作事务;人身的尊与卑;事物的贵与贱;人身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人力和事物使用的适用和浪费。

凡勃伦给劳作事务下的定义是,利用非人类的周围事物以提高人类活动的一切努力,都是生产性活动;非劳作事务包括:政治、战争、虔诚崇拜、运动比赛、公众欢乐等。生产性活动是人类营造本能的体现;非生产性活动引致了人类致嫉式比较和竞争的倾向。

致嫉式比较包括两种认识和思想习性。一种是把事物分作贵与贱的思想习性,如,生产性活动的成果是低贱的,非生产性活动的成果是贵重的,有价值的;另一种是把人身分作尊与卑的思想习性,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人,在生产性活动中体现出的品质是卑下的,从事非生产性活动的人,在非生产性活动中体现出的品质是尊荣的。区分事物贵与贱和人身尊与卑的思想习性进一步引起了劳作事务和非劳作事务的分化。生产性的活动同事物的低贱和人身或品质的卑下有了相对明确和一贯的联系转而成为劳作事务;非生产性的活动同事物的贵重和人身或品质的尊荣密不可分,融为一体而成为非劳作事务。

劳作事务和非劳作事务的分化不可避免的带来人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合作主要出现在从事劳作事务的个体间,营造本能和团体一致的意识也主要表现在这类人中间;竞争是非劳作事务所培养,所引致的行动习性。竞争是对自己和竞争者间的区分,是宣示、表现和证明自己和自己的品质尊荣,对手的品质、成就不如自己的一系列活动。

人类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就必须从事生产和消费,因此生产和消费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两大主要内容。生产是对人类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消费是对人类生产成果的消耗,而这两类消耗都可以用适用或浪费予以分类。适用表明消耗是为了满足共同体的生存、舒适或进一步生产的需要;浪费按照凡勃伦所说:“所以称作‘浪费’,是因为这种消耗从整体上说来,并无益于人类生活或人类幸福,而不是因为从事这种消耗的各个消费者的立场说来这是浪费的或精力的误用”(Veblen, 2007: 67)。

有闲阶级的诞生表明一种人际间尊卑(或荣辱)区分的制度出现了,它是共同体在掠夺文化初期劳动分工发展的结果,其制度基础在于私人财产制度的确立,其实质是共同体中以人身为基础的分化,是共同体中人际差异变为人际区分的持续过程。

2. 有闲阶级制度的起源

在掠夺文化的高级阶段有闲阶级制度有最充分的展现。然而,有闲阶级制度出现于掠夺文化

初期,首先源于男女间的分工。在文化演化的关键阶段,原始共同体中的活动逐渐分化成两类,分别被称之为拓殖活动与生产活动。战争和捕猎逐渐成为以拓殖为目的的狩猎团体中强健男子的专职;妇女则从事其他必要的工作。拓殖活动要求男子在力量和机智上有最佳的表现和发展,而生产活动是辛勤的,平淡无奇的。拓殖工作和劳作的区分逐渐成为共同体的相同感觉,并作为行为准则被固定下来。从事拓殖工作,表现勇武精神——力与诈——成为有自尊心的男子的积极义务;此外的工作是他们在道义上不许染指的。

伴随着男女间分工发展的是私人财产制度的确立。所有权的最初形态是团体中健壮男子对妇女的所有权,即妇女为男子占有。对妇女的所有权源于把女性作为共同体拓殖的战利品,作为俘虏的夺取。凡勃伦认为从敌人处抢劫妇女作为战利品的做法,促成了“占有制婚姻”的出现,并最终产生以男性为主的家庭制度。所有权因事实而成习惯,因习惯而拓展其概念范围,由此从对妇女的占有扩大到对妇女劳动成果的占有,进而产生对人身和一切事物的所有权。一种明确的财产所有权制度便逐渐确立起来。

有闲阶级制度是以拓殖和劳作业务的分工和财产所有权制度的确立为基础,是共同体分化的结果。在文化的和平阶段,男女两性在体格和生理上的特征以及他们的气质有的仅是差异。男女两性之间也存在着对共同体生存的功能上的差异。但是随着拓殖业务和劳作业务的分化,男女两性在生理和气质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功能上的差异,逐渐生成男女两性在思想习性和行动习性上的明确区分和活动事务上的明确区分。由于拓殖业务的累积性淘汰适应过程,男子在体魄上越来越强健,发展了凶猛、机敏等男性气质,也愈益习于用力与诈为手段,达成目的。在这个文化阶段上“把战利品作为可见勇武的证据,作为自己生活的随备品的本质特性在男子的思想习性中确立了位置。追捕或突袭到的捕获物、战利品作为卓越力量的证据而被赞誉。攻击成为公认的行动方式,捕获物成为成功的明显证据”(Veblen, 2007: 16 - 17)。尊荣和价值观念开始在男子的思想习性中立根,而追求尊荣是共同体分化,以人身为基础的区分的源动力。

随着财产所有制的确立,作为拓殖成功的战利品转而成为私人财产,拥有财产起初只是被看作是所有者勇武的证明、所有者尊荣的证明,现在转而具有了内在的荣耀性,并把这种荣耀性传递给所有者。占有、保有和累积财产成为博取尊荣的基础。共同体成员间根据特定的财富标准表现和证明自己的尊荣又引发金钱上的新的分野,进一步引发共同体内的阶级的区分。

3. 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

为获取和保有男子的尊荣,仅仅占有财富或权力是不够的,财富或权力必须提供证据,因为尊荣仅依凭证据授予。

在文化的掠夺阶段,财富的主要内容是奴隶,以及奴隶劳役和奴隶劳役的成果,因此明显地不参加劳动就成为金钱上的卓越成就的习惯标识,成为声望所归的习惯标识。在这个时期,明显有闲就成为证明财富所有者的尊荣,或值得授予尊荣的有效方式。在凡勃伦看来,有闲不是无所事事、清静无为,而是指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明显有闲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坚决地摒弃劳作不仅是体面的、值得赞誉的,还是保持身份和遵从礼俗的必要条件;其二,积极承担有闲阶级事务,包括政事活动、运动比赛、虔敬崇拜;其三,把徽章或勋章作为拓殖的习惯的、公认的标志,进而发展出品级、头衔、等次和勋位等制度;其四,努力取得一些准学术或准艺术的成就,如掌握古代语言和神秘学,精熟各类家庭音乐和家庭艺术,通达服饰、家具等时尚知识以及竞技比赛和运动规则的知识,乃至犬马一类动物的培养、驯服;其五,投入时间和精力把自己从一个粗野的人变作有风度、懂礼法、行礼仪的文明人;其六,蓄养奴仆作为炫富的手段;其七,财富、礼法、门客和仆从成为名门望族的主要标志,门第成为有闲阶级制度的一种主要形式。

在掠夺文化的早期阶段,消费女子生产的物品是男子的任务,而妇女的消费是维持生存、继续劳动的手段。这样的差别在掠夺阶段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习性,即不事生产而从事消费是尊荣的,是消费者勇武的标志,是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进而,消费行为本身,特别是对比较有价值的事物的消费,被认为具有内在的荣耀。在这样的共同体内这样的共同感受的指引下,明显消费成为尊荣竞争

的另一种主要方式。

涉及明显消费的主要内容有：(1)消费品禁忌：某些消费品具有礼仪上的特别作用，因此仅适合于上层阶级，甚或上层阶级的某些人专享，而其他阶级的人不得染指，比如酒和麻醉品在某个时期，就是出身高贵、有教养的男子的特权。具有礼仪功用的消费品的首要特征是昂贵。

(2)消费上的任情与精选：任情是要在消费品的量上达到或超过共同体公认的标准；精选是对消费品质上的特殊要求。有闲绅士要能对食物、酒、麻醉品、宅第、劳务、衣装、饰物、武器、摆设、娱乐品、福佑和祭拜用品等等精挑细选，肆意挥霍。若不能按照公认的数量和品质消费，则意味着屈从和卑下。

(3)鉴赏力的养成：对消费品的精挑细选成为有闲绅士智力锻炼的一项主要内容。他要能清晰、正确地辨别出哪些消费品是名贵的，哪些是普通的。对有闲生活中的种种事物，名贵食品、男用饮料、随身佩饰、得体衣装、建筑、武器、竞技、舞蹈、麻醉品、音乐、美术等等，他都要成为具有相应鉴赏力的鉴赏家。鉴赏力本身就是一个尺度，可以丈量尊荣的水平和身份的等级。

(4)公开的消费竞技：炫耀财富，以获得尊荣的最好办法是请自己的朋辈和同类竞争者作为财物浪费的见证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赞誉和尊重的效力也要远大于下层阶级的艳羡。办法是，馈赠珍贵礼物，举行豪华宴会，承办娱乐庆典。奢靡的集会不仅是家庭财富的公开展示，也是东道主在礼仪上精通程度的公开展示，是名门望族真正的竞技场。

有闲是财富所有者在时间上的浪费；消费是他在财物上的浪费，这都是表明财富占有的方式，都是通过向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显示而博取尊荣的手段。最初，两者是等效的、合一的，但是当共同体有了进一步的分化，不得不同更大的人类环境接触后，消费就比有闲更适宜作为礼仪表现的通常手段。一个人要使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普通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充分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在各种公共场合中展现自己的支付能力。因此我们会发现，城市居民的消费比例更高，以消费作为财富展示的手段，而乡村居民更乐意储蓄和举办家庭宴会，通过邻里的闲聊获取他们的尊重。随着从共同体向市民社会的转化，明显消费愈益成为比明显有闲更有效的展示手段。

4. 生活格式与金钱典范

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共同构成了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且作为礼仪标准影响了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促成有闲阶级生活方式变化主要是共同体中金钱典范的变化。

生活方式由特定时代或社会发展中特定阶段上的制度汇聚而成。从心理学上说，可以将其刻画成流行的精神态度或流行的生活理论。在共同体的生活中，群体成员对于人类生活方式中何者为应当、何者为善、何者为便利、何者为美总有各种观点或意见，而观点的共识即为群体的格式化的生活方式。有闲阶级的生活格式的主旨有：致嫉式对比，宣示财富和获取尊荣的竞赛动机，以及掠夺意向。其生活格式的内容主要由关于各种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的观点和理论组成。

社会或共同体中通行的生活方式，即怎样才算得体的和荣耀的生活方式大体上由最高阶级决定。最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通过训诫和示范顺着社会阶级的梯次向下传导。人口的流动性越小，各阶级间间隔越远，差异越明确，传导所需要的时间越长，传导的进度越缓慢。

遵从或以某种近似的程度遵从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所有低等阶级的义务。在现代文明的共同体中，社会阶级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而短暂，由上层阶级所树立的生活方式很少遭遇阻力就可以强势通达最低的社会等级。每一社会阶层上的成员都把他们上一层社会成员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得体生活的理想，并全力朝该理想看齐。

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主要受共同体中金钱典范变化的影响。金钱典范的核心是荣誉浪费准则，即在所消费的财物的数量与等级方面达到或超过习惯的礼仪标准。具体而言就是：

(1)标准有伸缩性；如果金钱力量有了增长，只要时间足够使人习惯金钱的增加，使所有者因金钱新的、更大规模的支出而获得了荣耀，标准就可以无限提高。

(2)从已经达到的消费标准后退远比为了适应财富增加而改变已有消费习惯更为困难，即，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3)许多习惯性的支出最初仅属于上层有闲阶级,是纯粹荣耀性的、浪费性的,而后随着财富的一般增长,随着消费礼仪标准的提高成为大众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中止这类消费不亚于放弃对生活与健康必要的消费。

(4)在任何社会,如果明显消费是生活方式中的一个因素,当个人的支付能力增长时,支付能力增长所采用的形式势必属于某种公认的明显消费形式,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生产效能有了极大提高,可以用较少的劳动和劳动时间取得丰富的生活资料,社会中劳作的成员所全力以赴的总是要在明显消费方面获得更高的成效,而非放缓脚步、松弛竞争的精神。

(5)荣誉浪费准则对责任感、美感、效用感、虔敬或仪式得体的感觉,以及真理的科学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6)金钱典范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它根据生活的礼仪标准阻止已经习惯的明显消费标准向后退;根据荣誉浪费准则淘汰不能表现财富、获取尊荣的感觉、观念和生活理论。

以上简要概述了凡勃伦关于有闲阶级现象的理论。

三、有闲阶级理论的成就和批评

从分析社会学的角度看,评判一种理论是否是一项突出的理论成就可以用三项标准:原创标准、有效标准和影响力标准。依循此标准,我认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就是一项突出的理论成就。

首先有闲阶级理论的原创性是无可质疑的,并且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公认(Dorfman, 1958; Diggins, 1978a; Jensen, 1987; Rosenberg, 1956; Diggins, 1978b)。根据前面对有闲阶级理论的概述,凡勃伦的原创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当时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为基础,运用演化论,改造了原有的哲学的或思辨的人性论,构造出演化人性观作为理论分析的工作假设。凡勃伦的演化人性论可能有不少缺点,但这些缺点不足以淹没它的原创性贡献。

(2)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有原创性的贡献。这个阶级理论的内容是现实的、成体系的,可以同韦伯、涂尔干以及熊彼特的阶级理论并立且毫不逊色。况且,单就阶级理论体系的完备而言,甚至胜而过之。

(3)把演化人性论作为有闲阶级理论的基础是一项卓越的方法论上的贡献。分析社会学理论无论其内容如何,都需要以一种恰当的人性论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前认识,因为这是分析理论发展所要求的。但是在同一部著作中,即清楚地表明自己的人性观,又仔细地发展了具体理论,在经典社会学家中还是不多见的。把演化人性观作为具体的有闲阶级理论发展的有机部分可说是方法论上的创举。

理论的有效性指的是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同我们当代社会现实的相关性,即其理论体系或概念工具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当代的社会现象,分析当代的社会事实所蕴含的内在机理。如米尔斯(Mills, 1953: xix)所言,凡勃伦对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的理论分析,依然对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有效。

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影响力无疑是深远的。单就消费社会学的研究而言:(1)凡勃伦关于鉴赏力的讨论启发了布迪厄关于鉴赏力和社会区分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2)凡勃伦暗示了有闲和消费中的符号性质,引发了鲍德里亚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3)关于明显消费的人类学讨论,引导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对商品进行深入的经验人类学研究,提出消费作为文化实践的理论。一般来说,现代学者关于消费社会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凡勃伦的消费理论的积极或消极的批评。

根据以上理由,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无疑是一项有卓越贡献的理论成就。如默顿(1990)所言,经典理论具有砾石的作用,阅读经典可以让我们质疑自己的思想的完善,促进自

己的理论发现。阅读经典理论不在于复述或诠释,还在于发现经典理论的缺陷,对经典理论的批评意味着阅读者自身理论思考的推进。

就消费社会学的研究而言,我对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有三项批评:

其一,我同意凡勃伦的看法,消费现象同阶级现象有内在的联系,对消费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必须以一定的阶级理论做基础。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阶级理论可以合适地作为消费社会学的分析基础,有闲阶级理论是合适的理论基础吗?可能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第二个问题是,阶级理论是消费社会学理论的唯一基础吗?参考消费现象的现代发展,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只要观察一下现代企业在塑造消费现象的作用,就应当认识到恰当的组织理论和资本理论同样是消费社会学的分析基础;

其二,凡勃伦似乎没有区分出权力的消费同金钱的消费的基本区别。在有闲阶级论中只有一种消费,即作为财富展示,追求尊荣的明显消费。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思索一番,不难发现古代帝王的消费和现代金融大亨的消费是不同的。前者是权力展示和权力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后者不仅是财富展示,也是资本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凡勃伦显然忽略了对消费现象中所表现的情绪的分析。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指出了上层阶级任情消费这一客观事实,却忽略了消费现象中的基本事实,即上层阶级对昂贵用品消费的痴情。上层阶级的宴会、舞会,以及现代公共集会中的消费往往伴随着集体欢腾也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一事实的分析应当成为消费社会学的有机部分。

参考文献:

科瑟,2007,《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默顿,1990,《论理论社会学》,何凡兴等译,华夏出版社。

熊彼特,2009,《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

Adorno, T. W., 1941, "Veblen's Attack on Cultur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9(3).

Davis, A. K., 1945, "Sociological Elements in Veblen's Econom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53(2).

Diggins, J. P., 1978a, *The Bard of Savagery: Thorstein Veblen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Diggins, J. P., 1978b, *Thorstein Veblen: Theorist of the Leisure Cla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Dorfman, J. 1958, "Source and Impact of Veble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8(2).

Dorfman, J., 1961, *Thorstein Veblen and His America*. New York: Kelley.

Dugger, William M., 1979, "The Origins of Thorstein Veblen's Though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60(3).

Edgell, S., 1975, "Thorstein Veblen's Theory of Evolutionary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34(3).

Edgell, S. & Tilman, R., 1989, "The Intellectual Antecedents of Thorstein Veblen: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23(4).

Harris, A. L., 1953, "Veblen as Social Philosopher: A Reappraisal", *Ethics*. Vol.63(3).

Harris, A. L., 1951, "Veblen and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Capitalis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1(2).

Jensen, H. E., 1987,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21(3).

Mayberry, T. C., 1969, "Thorstein Veblen on Human Na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28(3).

Mills, C. W., 1953,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or Editio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Rosenberg, B., 1956, *The Values of Veblen: A Critical Appraisal*.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Walton, J., 1993,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f Thorstein Veblen", *Thorstein Veblen: The life of Thorstein Veblen and perspectives on his thought*. pp245 - 251.

Veblen, T., 2007,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易众